

王天有 徐凯 万明 编

郑和远航与 世界文明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 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王天有 徐凯 万明 编

郑和远航与 世界文明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论文集/王天有,徐凯,万明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ISBN 7-301-09278-4

I. 郑… II. ①王…②徐…③万… III. 郑和下西洋 - 学术会议 - 文集 IV. K248.1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7231 号

书 名: 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王天有 徐 凯 万 明 编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278-4/K·03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42 印张 647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历史学学会和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暨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2004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英杰会议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陶西平和副主席张文启与会。会上,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学者齐集一堂,畅所欲言,对 600 年前郑和下西洋这个愈久弥新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近 80 篇论文发表,可以说这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本论文集是会议论文的选集。透过这本选集,我们看到本次会议的特点:

第一,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氛。600 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旷世创举,当纪念这一盛事 600 周年日益临近的时刻,中外学者表现出空前关注;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学者们提供一个平台,学者可以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自由命题,纵横发挥。它与有些会议“郑和搭台,经济或什么唱戏”不同,是学者搭台,学者唱戏,百家争鸣,风格各异,但唱的都是郑和这台大戏。因此我们把学术气氛浓厚作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这里特别要提到徐玉虎先生。徐先生是我国郑和研究的重量级学者,他关于《明郑和航海图中针路之考释》等论文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当他得知本次会议后,欣然应邀,并撰写《郑和下西洋于诸番国勒石立碑新考》一文,只是当启程赴会时,因年高体病为医生劝阻,但他致信会议,一定要列名与会名单,并请人代读他的论文。本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开成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正是各位学者像徐玉虎先生一样,热心参与,鼎力支持的结果。

第二,本次会议是一次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我们认为目前郑和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传统的中国史和海交史已涵盖不了郑和现

象的丰富内涵。一个渗透多学科基因的“郑和学”正在孕育之中。本次会议的论文反映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向。与会专家学者所涉及的专业相当广泛,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有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有研究民族学的学者,有研究宗教学的学者,有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者,有考古专业的学者,有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者,有科技史的研究者,有工程院的院士,有将军,有营养学专家,等等。多学科多层面多视角的学术交流,使本次会议对郑和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广度上都有很大进展。如钮仲勋教授、葛剑雄教授的论文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了郑和下西洋的贡献,给人以启示。罗宗真教授有关《南京龙江船厂遗址的调查和新发现》的报告为我们带来了郑和遗迹考古的新进展。葡萄牙学者金国平、澳门学者吴志良博士合著的《500年前郑和研究一瞥——兼论葡萄牙史书对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异国史料,开人眼界。章乐绮教授《郑和远航饮食考》一文,题目新颖,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梁志明教授、赵令扬教授、李焯然教授、孔远志教授、梁立基教授等人的文章研讨了郑和下西洋在海外的影响和意义,或宏观整体,或微观一国一个地区,引用当地史料,分析具体周详。徐凯教授有关明初礼治外交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的辨析,郑克晟、李庆新等教授关于明初海外贸易政策和朝贡体系的论证,都颇有新意。

第三,郑和下西洋至今 600 年了,对郑和的评价也有 600 年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严格来讲,用近世科学方法对郑和下西洋进行研究当始自 20 世纪初梁任公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后对郑和的研究评价基本是梁氏思想理路的延伸与发展。今天历史跨入了 21 世纪,郑和研究自当在继承上世纪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因此本次会议对郑和航海综合评价话语最多,反映出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多维思考。例如从世界文化或文明互动的角度评估郑和地位与贡献的有何芳川教授、滨下武志教授、范金民教授、郑培凯教授、南炳文教授、张哲郎教授、郑一钧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审视郑和下西洋的有陈尚胜教授;从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看郑和远航的有杨国桢教授、杨樵教授;从开放交流角度评价郑和下西洋的有席龙飞教授、王天有教授;从科学技术发展视角评价郑和远航的有龙村倪教授、孙光圻教授、陈延杭教授,从宗教因素考察郑和航海历程的有林松教授、时平教授;等等。这些多维

的思考有助于对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的全面评估。中西航海比较也是本次会议的热门话题。郑家馨教授《试论国家权力对 15 世纪中国和葡萄牙海洋活动的不同作用》,庞卓恒教授《两种文明 两种海外交往的价值取向》,张箭教授《郑和下西洋与西葡大航海的若干比较》,提出中西航海比较中的新思考,极有启发性。在这次会议上,郑和研究史,特别是近百年郑和研究的历史,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王晓秋教授《评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施存龙教授《梁启超〈郑和传〉的谬误和其始料不及作用》都是郑和研究学术史的力作。万明教授《释“西洋”》对中国史书上的“西洋”二字进行详实考证,颇有工力。我们认为,郑和研究的学术史实在有必要加以提倡和重视。有的论文也涉及对英国海军退伍军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的评说,如李金明教授《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此外美国学者、印尼学者、马来西亚学者、斯里兰卡学者、韩国学者、澳大利亚学者都就本国郑和研究情况做了介绍,表达了对郑和的崇敬之情,这是本次会议的另一道风景。会议论文对郑和远航的局限性也有中肯的分析,见仁见智,散见于各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中,特别是对郑和远航为什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威武雄壮的绝唱,而未能转化为社会转型的强力杠杆等等问题,提出了反思。

郑培凯先生曾用“郑和的世界和世界的郑和”的提法说明纪念郑和的意义,我们完全赞同。600 年前郑和不避风险,坚韧不拔,走出国门,扬帆远航,是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的宏伟篇章,是世界航海史的盛举;600 年后的今天,尽管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但世界和平发展的总趋向不会改变,郑和航海中和平的理念,国与国之间“共享太平之福”的夙求,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和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明年我们将迎来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届时将有更多的纪念活动展开,期盼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出现。

论文集由王天有、徐凯、万明负责编辑,协助者有梁文华、张晗、郭峰。限于篇幅,会议论文未全部收入。选入原则有二,一是作者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在本论文集发表的论文,二是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论文,至于有些论文虽然写的很精彩,但与会议主题关系不大,我们只能割爱。还有一些文章,虽然观点颇为新颖,但属于提纲性质,亦未收入。

IV 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

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赞助,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刘方先生的支持,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王天有 徐 凯 万 明

2004年12月10日

目 录

前 言	王天有 徐 凯 万 明(1)
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	何芳川(1)
“为什么我不知道郑和这一位伟大的航海探险家?”	
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张哲郎(13)
郑和下西洋对 15 世纪初期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郑一钧(21)
关于 15 到 16 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	南炳文(40)
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范金民(50)
纪念郑和航海弘扬华夏海洋文化	杨 樾(58)
郑和下西洋于诸番国勒石立碑新考	徐玉虎(68)
释“西洋”	万 明(97)
郑和航海与天妃信仰史料的补遗及考释	时 平(114)
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调查和新发现	罗宗真(124)
郑和远航饮食考	章乐绮(130)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	钮仲勛(137)
郑和远航最本质的概括当是开放交流和发展	席龙飞(144)
明初之世界观及郑和下西洋之时代意义	赵令扬(150)
郑和下西洋与隆庆开关	王天有(164)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陈尚胜(168)
明代“礼治”外交与郑和下西洋	徐 凯(181)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初海外贸易政策的转变	郑克晟(195)
再论郑和在海外的影响及其意义	孔远志(203)
郑和下西洋与朝贡体系	李庆新(228)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葛剑雄(253)
认识世界,发现世界

——郑和下西洋重要的历史功绩 谢本书(260)

郑和远航与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晁中辰(267)

从中国海洋传统看郑和远航 杨国桢(272)

Trade Policies in China under the Tribute System as Bounded

Rationality Hun-Chang Lee and Peter Temin(279)

试论国家权力对 15 世纪中国和葡萄牙两国

海洋活动的不同作用 郑家馨(312)

郑和下西洋与西葡大航海的若干比较 张 箭(350)

郑和航海:中国文明与伊斯兰科技 龙村倪(366)

两种文明 两种海外交往价值取向

——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比较 庞卓恒(382)

郑和与哥伦布航海技术文明比较研究 孙光圻 王 莉(392)

郑和远航在台海历史中的价值 赖进义(401)

略论占城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为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而作 梁志明(408)

郑和下西洋前南海形势:论明帝国与满者伯夷的角力 ... 郑永常(422)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 梁立基(448)

New Ports: The Zheng He Voyages and Economic/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403—1687 James A. Cook(456)

Leave Track of Zheng He's Visitation Voyage to

Nusantara (Indonesia) Hembing Widjaja Kesuma(468)

Admiral Zheng He and Contemporary Malaysia Lee Kim Hing(481)

500 年前郑和研究一瞥

——兼论葡萄牙史书对下西洋中止原因的分析

..... 金国平 吴志良(500)

剖视郑和生平与航海历程中贯穿始终的宗教因素 林 松(511)

百年前中国人对郑和远航的认识

——评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王晓秋(517)

梁启超《郑和传》的谬误和其始料不及作用	施存龙(524)
永乐造船、郑和航海与宝船	
——郑和下西洋舟师的古船研究之一	郑 明(544)
南京郑和文化遗存简论	季士家(554)
福建长乐民间郑和崇拜现象析	曾国新(566)
郑和船队有可能发现美洲吗?	李金明(571)
郑和船队发现了澳洲吗?	
——评孟席斯的新说	廖大珂(585)
Zheng He in American Classrooms: Some Approaches	
.....	Ann Waltner(605)
纪念郑和,加强睦邻友好	林源瑞(628)
郑和、东南亚的回教与《三宝垄编年史》	陈达生(637)
现实与历史: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关系	吴小安(645)
纪念郑和 研究郑和 弘扬郑和	张宝印(658)

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郑和远航 600 周年。

倘若历史在时光的隧道中回流，跨越六个世纪的时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一支规模空前的远洋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从中国的海岸向南、向西，驶向遥远的天际。这是一支庞大的海上商队，其基本成员却是军人；这是一支雄强的海上武装，肩负的使命却是和平。

六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听到郑和船队对历史的诉说；而太平洋、印度洋两洋的风涛轰鸣，正是郑和远航的巨大回响。

那轰鸣与回响，凝聚成为今天对昨日的深刻领悟，领悟出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怎样在自低向高的文明阶梯上，走过艰难，走出辉煌！

—

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文明之间就有交流、交汇。在整个文明的交流与交汇史上，唯有以郑和远航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对外交往最文明。因为，它最和平。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它的朝霞时期，那些处在农耕地带的民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创造了不少上古文明的奇葩。然而，那些游牧圈的族群，则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它们正处在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此时，对于这些族群来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战争成了经常的职业了。”^{〔1〕}因此，几乎所有古代游牧族群向农

耕文明地带的迁播与扩展,都伴随着暴力、战争与文明的破坏。有的如汪达尔人,一路杀来,留下一路文明的碎片。

自中古以降,人类文明发展到古代形态的成熟期,逐渐形成了规模不等的文明圈。举其大者有三:伊斯兰文明圈、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和中华文明圈。次之,还有印度教文明圈、佛教文明圈、美洲印第安文明圈,等等。在三大文明圈中,由于伊斯兰文明圈的居中地位,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彼此几近隔绝,难以交汇。

伊斯兰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在世界中古史上,它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汇史上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与中华文明的交流,结出了丰硕成果;特别要指出的是,许多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精华,恰是由伊斯兰文明保存下来,反馈欧洲,催发了那里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然而,当伊斯兰文明崛起的时段,广大穆斯林在圣战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这一过程却绝非和平,而是充斥着战争、暴力、劫掠和杀戮。或许,这是人类在文明提升历史进程中所难免要付出的代价?

西方基督教文明也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给人类贡献了一个近代世界,使人类在文明的阶梯上,跃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这一文明崛起乃至兴盛的整个历史阶段,几乎每一页都书写着血和火,乃是不争的史实。

例如,罪恶的黑人奴隶贩卖;

例如,对美洲印第安人灭绝性的杀劫;

更骇人听闻的是,基督教文明扩张的代价,竟曾是破坏基督教文明。例如,十字军东征,竟令君士坦丁堡毁成一片废墟。一位目睹十字军暴行的拜占庭作家指出,甚至伊斯兰教徒都比这些骑士更仁慈、更温和些。

所有上述文明史上的反文明记录,给人类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记忆基因,那就是:每当一个文明崛起及兴盛的时候,特别是大规模文明崛起及兴盛的时候,一种巨大的威胁也就悄然逼近了。

然而不然。

在一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在对外流播其影响时,其主流与基调却是和平的。郑和远航,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让我们先看史实:

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必须看到,它又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乃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乃是武将军职:“总兵官”^[2]。这才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它如果以战为业,在海外从事什么“圣战”之类,所向披靡,那么,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还有一片干净土么?!

但郑和七下西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一次,发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而且,就事论事,在郑和而言,那也是一次被迫无奈下的防卫性奇兵制胜,将兵祸压缩到最小限度^[3]。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主要的作为,几乎永远是友好交往: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宗教礼仪,等等。对于亚非地区那些正处在文明前夜或文明初阶的居民而言,其“尚武”、“凶悍”、“好斗”、“狂暴”的负面状态,在郑和远航活动的全方位文明流播面前,无疑受到一次陶冶式的积极影响。

“天书到处多欢声”,^[4]郑和的对外交往,一路留下的是中华古代先进的文明,一路留下的是友好的欢声。

所谓“天书”,指的是大明皇帝的国书。大明天子用“敕谕”的形式,致信各国君主,确实是有些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待人的味道。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对此引以为训。但是,当我们细品这些信件的内容,就会为其中深深浸透着的诚挚的和平、友好愿望而感到欣慰。这些愿望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共享太平之福”。

明太祖朱元璋强调其对外方略说:“中国奠定,四方得所,非有意臣服之也。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5]

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祇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6]

明宣宗朱瞻基也要求“诸番王”,“其各敬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7]

四代三帝,一以贯之,再三宣示其“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何等的坚定、清晰!这是大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是古代中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郑和及其统率的庞大远洋船队,正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忠实执行者。

“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是古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优点。这种理念,根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存环境之中。作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农民民族。农民民族是束缚在土地上的民族;是受制于播种与收获的民族;是期盼不违农时,四时安平的民族;是不冀攻掠而但求稳守家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层面就必然凝聚出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和为贵”。“共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在大明天子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当大明帝国崛起与雄强之际,它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郑和远航船队,追求的乃是一种文明的理想,是止戈为武;是和平;是“共享太平之福”。

二

郑和远航,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拥有一种强烈的、自觉的文明使命感,即致力于提升远近诸国的文明化程度。

首先,在物质或器物文明层面,郑和船队运往海外诸国大量的中国精美产品,刺激了各国不断提升的物质文明的社会需求。

以丝与瓷为代表的中华物品,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例如:

“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绦绢烧珠等物,甚爱之。”^[8]

“最喜青花瓷器”;^[9]

“好市华人磁瓮”;^[10]

“中国人往贾者,冀其复来,临归,辄留数人为质”。^[11]

诸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均深受中国影响,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

为此,郑和特带领铸币工匠,前往马六甲,以斗锡仿铸类中国铜钱之锡币。

在制度文明层面,郑和远航所致力于宣扬和推广的,主要是中华帝国长期构建的“华夷秩序”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大明帝国在内部构建强化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也在致力于这一体制的外延即华夷秩序的维系与强化。作为帝国的代表,郑和在这方面的使命是

十分明确的。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祇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不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永乐七年三月□日。^[12]

上述这条资料，十分典型。它清晰无误地宣示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郑和船队，反复远航，要整合、维系、推广的，就是以中华帝国及其代表——中华帝王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国际格局。

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郑和统率的远洋船队及数万官兵，规模庞大，气势雄威，组织严密，军容严整，更是中华制度文明的外在表现。正是这些外在表现，展示了中华帝国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与引力。其结果，是一众诸国纷纷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是各国对这一制度文明的认可和对华夷秩序的不同程度的接受。

在精神文明的层面，郑和远航的使命感就更加强烈。

这个使命感，直接来自大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精神追求。

中华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是它在精神文明的最高体现。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就是希望将这种最高境界的礼乐文明广为流播。即所谓：“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迹，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13]

明成祖永乐大帝这种追求尤为强烈，“恒遣使宣敷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14]这就是所谓“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显然，“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就是要用中华那一套礼乐文明、儒家伦理道德，去影响诸国，促进其文明化。

郑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15]且与佛教、伊斯兰教深有渊源，乃是执行这一海外文明化任务的最佳人选。果然，郑和对此一使命是须臾皆在念中，以致勒石纪事时，也念念不忘：“宣德化而柔远人”。^[16]

郑和所到之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这开读，即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就是其“宣教化”，推广中华精神文明的开宗明义第一章。

“宣教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17]所

谓“正朔”，即中国历法。郑和出使诸国，要代表大明皇帝“颁正朔”，要求各国接受并遵行中国历法。乍看来，“颁正朔”不过是赠送一本中国历书给各朝贡国，似乎很简单。实际上，这“正朔”内容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包含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等，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华帝国正是力图透过“颁正朔”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应该说，在郑和那个时代，中华帝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文明梯次上的落差是很大很大的。这样巨大的文明差距，使郑和船队大规模的访问对那些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文明冲击。一时间，“愿比内郡依华风”，^[18]“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还国”^[19]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在这股“依华风”的热潮下，各国纷纷遣使来华。其中，国王亲自率团来访者就是四国八次。渤泥国王麻那惹加纳乃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20]对中华礼仪文明倾慕之心，至死无悔。

地处越南南部的占城，在郑和到访时尚“不解正朔，见月起舞”；^[21]若干年后，“上元烟火，已知节候”，“久与中华往来，渐沾王化”。“前后难以概视耳。”^[22]

远在南印度的柯枝，在“依华风”劲吹之下，亦有变化。郑和船队的到访，令当地民众“顺附如归，咸仰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23]这条史料，虽或有夸张，然从物质到精神，中华文明的积极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郑和远航所实行的文明流播，乃是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文明化业绩。在促进与提升远近各国文明化的时候，尊重和注意各国国情，采取相宜的措施，也是郑和远航活动的一大特点。

例如，锡兰（今斯里兰卡）已有久远的佛教传统。国王亚烈苦奈儿却“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24]在对郑和的作战中，轻易失败被俘。郑和在该国的活动，则是弘扬佛法，布施佛寺，推动佛教文明进一步发展、繁荣。

又如，“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在1411年，在安哥、安卓尔、里汶、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25]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研究权威哈姆加

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发展，是与中国一位穆斯林有关，即郑和将军。”〔26〕

三

在郑和远航活动的几乎同时，西方基督教文明圈开始了另一项伟大航海事业。1415年，就是郑和首航十年以后，葡萄牙人占领了北非的休达，由此展开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航行。由“航海者”亨利王子倡导的这项事业，最终导致了瓦斯科·达·伽马绕航好望角，于1498年开辟完成新航路而抵达印度。

与达·伽马绕航好望角堪称双星远航的，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

从历史长河上看，郑和远航与西方的大航海事业，可说是同步展开。

郑和与他所代表的中华帝国、中华文明，在当时的远航竞赛中占尽了风流，却在历史长河的文明竞赛中终成输家，竟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逐渐失去了命运之神的眷顾。

包括我本人在内，人们常常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当我们欢呼郑和首航即远达南印度的古里（即卡利库特），我们看到的是葡萄牙人迟后九十多年才到达这个港口。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即：郑和走的是千百年来亚洲各国船长和海员们所熟知的航线，是一次驾轻就熟、老马识途之旅；而迟到的葡萄牙人，在几十年里一直在和陌生的海域拼搏，在风涛怒吼中开辟自己的新航线，锤炼自己的创新精神。

从“航海者”亨利到达·伽马与哥伦布们的这种创新精神，根植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环境之中，而这一文明环境在中世纪晚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质的变化。

大致在公元11至13世纪，欧洲进入了贸易和城市大发展时期，从意大利牵头，到西欧广大地区，新型的工商业都市迅速发展。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雏形——市民力量的勃兴，支撑了半独立的自由城市直到城市共和国的涌现。这一势头虽经14世纪百年战争与黑死病瘟疫的双重巨大破坏，但并未受到结构性的打击。同样的势头虽然在中国也曾有过萌动，却受到大一统的帝王集权的致命扼制未能展开。居民